

雲南新軍與辛亥革命

(1907-1911)

楊 維 真*

摘 要

本文之目的在於以雲南爲例，探討清末新軍編練的成效及其與辛亥革命的關係。自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之後，爲重建國防武力，清廷開始逐步編練新式軍隊，實行軍事改革。及至一九〇一年因八國聯軍之役簽訂辛丑和約後，清廷更加快軍事改革的腳步，將其範圍擴及全國；除了在中央設立專責機構，制定練兵辦法外，並積極推動新軍的編練。雲南於奉命編練新軍後，初期成效不彰；然而自一九〇七年錫良接任雲貴總督以來，滇省軍事改革不論是在新軍的編練或是陸軍講武堂的創辦上，都取得一定的成果，其發展成績尚稱理想。清廷創建新軍原是爲了鞏固其政權，但雲南卻因爲部份新軍軍官態度傾向革命，日後這些軍官更帶領新軍發動雲南辛亥起義，反而敲響了清廷覆亡的喪鐘。雲南新軍在滇省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也是清末編練新軍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之一。

*作者爲本校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現爲國立台北工專共同科兼任講師。

一、前言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二十天後，雲南光復，成爲第六個宣告獨立的省份，也是西南各省率先獨立者。隨後滇省分兵川、黔，策動西南革命運動，頗有助於全國革命之聲勢。雲南光復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其間有不少仁人志士投注大量心血，遂使革命情勢逐漸成熟，終底於成。惟光復雲南的主要力量乃是新軍，在起義的過程中，滇省新軍曾與效忠清廷的軍隊進行激烈的戰鬥。光復後的雲南地方政權大體上亦由新軍軍官掌握，且於日後維持相當穩定的局面，這在其他起義各省是不多見的。

清季清廷編練新軍，主要是爲了鞏固其政權，強化傳統體制，以抵禦外來壓力。（註一）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當革命的時機到來時，大部分新軍即都轉向革命的一方，並爲清廷敲響覆亡的喪鐘。（註二）清廷施行軍事改革，終不免反過頭來衝擊傳統體制，甚至瓦解傳統體制。面對此一現象，本文擬就雲南施行軍事改革做一觀察，除說明雲南新軍—陸軍第十九鎮的編練及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創辦經過外，並將探討在雲南辛亥革命的過程中，新軍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

二、辛亥革命前夕的雲南情勢

雲南革命的情勢，自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後，有了很大的進展。在同盟會成立前，據資料統計，雲南僅有兩個革命團體；但自同盟會成立之後，雲南革命團體激增至十二個，並有三所宣傳革命的學校。（註三）這些情勢的發展，與滇省留日學

註一：C.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p. 121.

註二：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再版），頁一一〇。

註三：同註二，頁六六〇～六六二、六七二～六七九、六八一～六八四。此處革命團體的統計，包括雲南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的團體。

生有密切關係。隨著清末新政的推展，中國在各領域均急需新式人才，清廷為培育新式人才，除了在國內設立各級新式學堂外，更派遣大量學生出洋留學，以求速效。而日本即因地理、語文等條件優越而成為最適宜留學的國度，中國學生留日熱潮乃為之興盛。雲南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開始選送十名學生到日本留學，其後一如其他省區，雲南留日學生逐年增多，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就有學習陸軍的三十人，學習師範、法政、實業等百餘人赴日，盛況空前。（註四）至辛亥革命前夕為止，總計滇省留日學生人數多達數百人。（註五）這些留學生到了日本之後，受到革命風潮的影響，紛紛參與革命活動。當時革命之說瀰漫僑界，各地志士聚集東京，孫中山為結合反滿力量，推動革命的進行，乃於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一九〇五年八月）在東京成立同盟會。雲南留日學生先後加入同盟會者有四十餘人，並在東京成立同盟會雲南支部，由呂志伊任支部長，積極展開宣傳革命與發展組織的工作。（註六）

辛亥前夕的雲南形勢，正如同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所分析的，有兩個導致革命的因素：一為官吏貪污，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憤慨；二為外侮日亟，英佔緬甸、法佔安南，皆以雲南為其侵略的目標。滇省人民在官吏壓榨與外侮侵凌之下，易於鼓動奮起。（註七）在這種情況下，同盟會雲南支部乃一方面創辦《雲南》雜誌，以做為宣傳革命的言論機關；另一方面則派員回滇，組織革命團體，開展革命活動。

《雲南》雜誌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在日本東京創辦，由滇籍留學生李根源、趙伸任幹事，張耀曾為總編輯。《雲南》雜誌從創刊到辛亥革命後結束，長達五年之久，共發行二十三期及特刊一期，以宣傳西方政治學說，揭露清廷的黑暗統治及反對英、法帝國主義侵略為宗旨，對於雲南的革命情勢起了很大的作用。《雲南》雜誌的出版發行日漸擴大，發行人數由最初的三千冊增加到一萬冊，並在北京、貴陽、昆明、雲南的九個縣城以及緬甸的瓦城設有分社；另外在全國三十九個城市、雲南各府州縣及海外的新加坡、安南設有代辦

註 四：李根源，《雪生年錄》（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無出版年月），卷一，頁九～一〇。

註 五：馬繼孔、陸復初，《雲南文化史》（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頁四九九。

註 六：《雲南近代史》編寫組，《雲南近代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頁一九六～一九七。

註 七：李根源，《雲南雜誌選輯·序言》（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所，各地都派有行銷員負責行銷。（註八）《雲南》雜誌遂成爲當時滇省暢銷的書刊之一，雲南民眾譽之爲「救死藥」、「醒夢鐘」。（註九）由於雜誌中激烈的反清言論不容於滇省當局，雲南提學使葉爾愷乃下令逮捕《雲南》雜誌在滇的行銷員，並禁止學生閱讀。（註一〇）然而私下傳閱者仍然很多，《雲南》雜誌的影響力有增無減。

至於同盟會在雲南的組織工作和活動，則要從滇籍同盟會員楊振鴻歸國後開始。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楊振鴻自東京振武學校畢業回國，在昆明設立同盟會支部，「聯絡三進志士，發起死絕會，組織公學會，及各府同鄉會，皆爲革命之秘密機關。又創辦體操專修科，召集學生數百人，朝夕訓練，暗播革命種子。」（註一一）昆明地區在他的影響下，相繼成立了誓死會、興漢會、滇學會、敢死會、公學會、死絕會、決死會、天足會、保礦會等革命組織，進行革命活動。（註一二）隨後楊振鴻奉委西防騰永巡防隊第四營管帶（營長），抵達騰越後，楊氏著手「改良營規，教練新式兵法，設立初等小學校，組織演說會，於軍事及改革問題，均實力鼓導之。」（註一三）並積極進行革命工作，以隨帶之革命黨員充任騰越各學校體操教員，創辦體操學堂（楊氏自兼校長），從教育入手，培育革命黨人。此外楊振鴻還吸收了張文光、劉輔國等人入同盟會，使騰越成爲同盟會在雲南的第二個活動中心。（註一四）其後楊振鴻雖因從事革命爲清廷通緝，乃離滇入緬，轉赴日本，但滇省的革命事業仍持續發展，革命聲勢日漸擴大。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同盟會發動雲南河口起義，一舉攻克河口、蠻耗、南溪一帶，革命聲威震驚國內外。起義軍奮戰長達一月之久，最後雖然失敗，但卻動搖了清廷在雲南的統治，給予滇省志士極大的鼓勵。同年底，楊振鴻率部份革命黨員再度回滇，發動保

註八：郭惠青、李慧琴，〈中國留日學生與辛亥革命時期的雲南〉，《昆明師院學報》，一九八一年第二期，頁六。

註九：孫代興，〈辛亥革命在雲南〉，《昆明師院學報》，一九八一年第四期，頁三〇。

註一〇：同註八。

註一一：〈雲南光復諸人事略·楊振鴻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頁二八三。

註一二：郭惠青、李慧琴，〈中國留日學生與辛亥革命時期的雲南〉，頁六。

註一三：同註一一。

註一四：張天放、于乃仁，〈回憶辛亥革命時期雲南的楊振鴻〉，《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昆明，一九八一年八月），頁二八～三〇。另見同書周開勳，〈騰越起義的一點回憶〉，頁七〇～七一。

山起義，雖因準備不周而告失敗，楊振鴻亦不幸病死於蒲縹，但革命的影響卻在雲南不斷擴大。適逢此時法國掠奪雲南七府礦權，英國也伺機侵略滇邊片馬等地，激起雲南群眾的強烈憤怒，紛紛集會請願，如雲南陸軍小學堂學生楊越、趙慎修即斷指割臂以抗議法國侵略，要求收回七府礦權。（註一五）在此內外交盪下，滇省革命條件日趨成熟。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同盟會總結以往起義失敗的教訓，轉而注意雲南新興武力一新軍，並開始在新軍中開展工作。

三、雲南新軍的編練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一役，清廷新式軍隊—「武衛軍」遭受重創。辛丑（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一年）和約簽訂後，為重建國防武力，清廷乃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設立練兵處，統一全國新軍之編練，並隨時督導考察。練兵處以慶親王奕劻任總理，袁世凱為會辦，鐵良為襄辦；通令各省設督練公所，編練各省新軍。（註一六）滇省奉命後乃開始編練新軍，但因條件差，進展緩慢，收效甚微。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丁振鐸出任雲貴總督，他對於編練新軍比較積極。經兩年多的艱苦經營，雲南才編成陸軍步隊一協（旅），砲隊兩營，不僅數量少，官兵素質亦差，甚至無力進行新式訓練，「故雖為新軍而仍無新軍之實際」。（註一七）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秋，奕劻等奏定分省限年編練全國陸軍計劃，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鎮，而「雲南控制西南邊徼，應厚集兵勢，設立兩鎮」，（註一八）乃規定雲南編練新軍兩鎮，並限五年完成。（註一九）同年四川總督錫良改任雲貴總督，乃隨調胡景伊、

註一五：繆嘉琦，〈記雲南陸軍學堂在辛亥革命期間的反帝鬥爭〉，《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一二五。

註一六：《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五二二，頁一〇。

註一七：雲南省歷史學會、雲南省中國近代史研究會編，《雲南辛亥革命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頁六八。

註一八：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翻印，《新纂雲南通志·卷一三〇·軍制考四·清代軍制三》（昆明，一九八九年），頁一。

註一九：茅海建，〈雲南陸軍講武堂與辛亥雲南起義〉，《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二年第三期，頁七三。

陳宦、張毅至滇，協助積極編練雲南新軍。錫良接任雲貴總督後，奏准添編步隊一營、輜重隊一營，滇省共成步隊六營、砲隊一營、輜重隊一營，乃成立雲南陸軍混成協，並以陳宦出任協統。（註二〇）此外，錫良又以胡景伊總辦參謀處，掌軍事計劃；以陳宦總辦兵備處及教練處，掌軍事籌備及教育計劃；以張毅充統領，厲行練兵。舉凡所有軍事機關、學堂及部隊之官弁員佐，以及餉項器械等等，概由四川補充，雲南軍事初基乃漸形穩固。（註二一）

光緒三十四年底（一九〇九年初），陸軍部派一等檢查官崔祥奎隨帶大批北洋陸軍官弁赴滇，並飭滇省於年內先成一鎮，從速開練。（註二二）崔祥奎抵滇後立即著手將雲南新軍一混成協擴編為鎮，並以北洋軍官充任各級幹部。（註二三）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二月，雲南新軍一鎮編成，按照清廷陸軍部的統一建制，雲南新軍的番號編為「暫編陸軍第十九鎮」，由崔祥奎出任統制，但因「南北將士各不相能，戎行頗欠輯睦」。（註二四）依照清廷的練兵計劃，雲南因毗連緬、越，正好位於英、法侵略的要衝，國防位置重要，所以規定雲南編練新軍兩鎮；但是由於經費不足及其他條件的限制，終清之世，滇省一直只有第十九鎮一鎮。第十九鎮下轄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協，每協轄步兵兩標（分別為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標），每標有三營，每營分前、左、右、後四個隊，隊之下是排、棚，每隊定制步兵一百二十六名。除了步兵之外，第十九鎮還轄有馬隊、砲隊各一標，工程隊、輜重隊、機關槍隊各一營，陸軍警察（憲兵）一隊及軍樂隊一部。（註二五）

第十九鎮及其配屬部隊的駐防地區分別是：第三十七協駐省城昆明，協部及第七十三標駐城南巫家壩，第七十四標駐城北較場；第三十八協第七十五標駐臨安，協部及第七十六標駐大理；馬隊、砲隊等標營則分駐省城一帶。按清朝新軍編制一鎮定額一二五一二人，雲南陸軍第十九鎮官兵實有總額是一〇九七七人；（註二六）在所有南方各省的新軍中，其數

註二〇：《新纂雲南通志·卷一三〇·軍制考四·清代軍制三》，頁六。

註二一：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謝本書等編，《雲南辛亥革命資料》（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頁一一。劉存厚曾任雲南新軍軍官及講武堂教官，參與過雲南辛亥革命，後出任四川督軍。

註二二：《新纂雲南通志·卷一三〇·軍制考四·清代軍制三》，頁七。

註二三：茅海建，〈雲南陸軍講武堂與辛亥雲南起義〉，頁七三。崔隨帶官佐一七九員，弁兵二十七員。

註二四：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頁一一。

註二五：《雲南辛亥革命史》，頁六九。

註二六：《新纂雲南通志·卷一三〇·軍制考四·清代軍制三》，頁二二。

雲南新軍與辛亥革命（一九〇七～一九一一）

量僅次於四川的一六〇九六人。（註二七）與此同時，雲南原有的巡防軍也改定營制，編成南防十營、西防十一營、普防三營、江防五營、鐵路巡防十四營、開廣邊防二十營，合計六十三營二四四四二人；加上新軍，滇省總兵力為三五四一九人，其數量已相當龐大。（註二八）

雲南陸軍第十九鎮既已建成，其全鎮武裝器械，頗稱劃一。步隊及馬隊配屬德造的毛瑟槍（一九〇八年造，六·八釐米口徑，通稱「六米八槍」）；砲隊擁有五十四門最新型的德國克魯伯廠七十五釐米山砲；機關槍隊則有二十四挺八釐米單人操作的馬克沁機槍，以及十二挺雙人操作的柯爾特式（Colts）機槍。（註二九）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當初雲南計畫成立兩鎮新軍，故而向外購置的軍械亦是以裝備兩鎮的兵力為度，因此槍械庫存豐富，補充不虞匱乏。（註三〇）另外每一士兵皆配有背囊、水壺、飯盒、外套、毛毯等物項，其裝備完全仿倣德、日等國陸軍。（註三一）

第十九鎮的士兵來源，最初部分係由原巡防隊改編而來，軍風紀、訓練皆不理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錫良接掌雲貴總督後，經陳宦大力整頓，戰力始稍有可觀。（註三二）及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編練成鎮後，乃採用募兵制，以全滇各屬男丁年在二十至二十五歲者，募編入伍為陸軍常備軍，服役三年期滿則退為續備軍。（註三三）而士兵優渥的待遇—正兵月餉四兩五錢銀，副兵（士兵中階級最低者）月餉四兩二錢銀，而每月伙食僅約一兩左右，所剩餘額士兵尚可養家—也形成很大的誘因。（註三四）在錫良以全省為範圍

註二七：Donald S. Sutton,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2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p.66. 據Sutton估計，雲南陸軍第十九鎮總額至一九一一年八月已達一二五〇〇人。

註二八：《新纂雲南通志·卷一二九·軍制考三·清代軍制二》，頁一〇～一七；《卷一三〇·軍制考四·清代軍制三》，頁二二。

註二九：Sutton,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25*, pp.66-67.

註三〇：蔡鏜，〈滇省光復始末記〉，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頁二二五～二二六。此項庫存軍械對日後雲南發動護國之役助益極大。

註三一：蔡鏜，〈覆李根源電〉，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頁一三四。

註三二：陳天貴，〈我接觸到的雲南光復片斷〉，《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一〇一。

註三三：《新纂雲南通志·卷一三〇·軍制考四·清代軍制三》，頁七～八。

註三四：楊如軒口述、胡彥整理，〈辛亥革命雲南「九九起義」前後〉，《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八〇。

的募兵計劃及其他相關條件配合下，一批「年青、樸素、容易適應軍事急務」（註三五）的士兵應募入伍，取代舊的兵員，構成新軍的主體。（註三六）在系統的訓練計劃下，雲南新軍戰力有長足的進步。（註三七）據學者劉鳳翰的研究，清末新軍依陸軍部評鑑共被分為五等，其中雲南新軍第十九鎮被列為第三等「佳」級；而被列為頭二等「優」、「良」二級者多為成軍較久的北洋六鎮及湖北新軍第八鎮。雲南新軍第十九鎮在裝備、訓練等方面皆不遜於北洋及湖北新軍，惟較缺少戰鬥經驗及兵員未足額而已。（註三八）

雲南新軍編練較弱的一環可能是在軍事幹部上。在編練之初，軍隊幹部多由四川調補；及至崔祥奎將滇軍擴充成鎮時，復以隨帶之北洋軍官充任各級幹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廣西巡撫李經羲改任雲貴總督，調靳雲鵬為總參議，王振畿統領三十七協，鍾麟同統領三十八協。靳、鍾、王三人皆山東人，隨帶江北學堂學生數十名，乃裁去滇軍中川籍官佐而以之補充。（註三九）此外李經羲復參用滇籍留日士官生。據一位雲南新軍軍官劉存厚分析，當時第十九鎮軍官可分為三派：一、北派以山東人最佔優勢；二、南派則為川湘及江北滇軍界人員，團體渙散，勢力甚薄弱；三、滇派係本省（指雲南）留學生組織而成，其勢力在南北兩派之間。三派互為水火，積不相容，識者憂之。（註四〇）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補充幹部，增進軍官素質，乃成為當務之急。

註三五：Sutton, *Op.cit.*, p.68.

註三六：這些主要來自農村的新軍士兵，大多加入哥老會，同盟會員曾透過哥老會在軍隊中進行宣傳等工作。見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昆明，一九六二年三月），頁一一〇。

註三七：Sutton, *Op.cit.*, p.69.

註三八：劉鳳翰，〈論新軍與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二年六月），頁一五四～一五七。

註三九：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頁一一～一二。這些隨帶之江北學生可能是江蘇陸師學堂的學生。

註四〇：同前註，頁一二。

四、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創辦

清廷爲了編練新軍，需要一批具有新式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能的軍官。爲培育這些軍官，清廷一方面派遣學生出國留學，向歐日等國學習軍事；另一方面則是同時在國內開辦軍事學堂，加速培訓新軍軍官。在派遣留學生方面，雲南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開始申送學生赴日學陸軍，當年即有三十人進東京振武學校學軍事。（註四一）兩年之後，有二十二人自振武學校畢業，升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六期，其中包括唐繼堯、李根源、羅佩金等人。這些士官生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學成返滇後，紛紛加入新軍工作，對於新軍體質的改變、革命風氣的散播，以及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創辦，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開辦軍事學堂方面，隨著新軍的陸續編練，於是有陸軍學堂教育的出現。先前由於各省軍事教育雜亂無章，練兵處乃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奏定陸軍學堂辦法二十條，陸軍學堂教育遂由此分爲三類：一、正規教育；二、速成教育；三、補習教育。（註四二）在正規教育方面，清廷規定各省設立陸軍小學堂，陸小畢業後升入陸軍中學堂（分設北京、南京、武昌、西安四處），陸中畢業後再進入設於保定的陸軍兵官學堂，其上還有陸軍大學堂，以接受完整的軍事教育。（註四三）另爲培訓大批初級軍官，乃於各省設立陸軍速成學堂，施以短期訓練即下部隊帶兵。所謂補習教育，就是興辦講武堂，輪流調訓在職陸軍軍官，以提高其各種軍事學的素養，性質頗類似將弁學堂。（註四四）在清廷練兵處通令下，雲南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成立了陸軍小學堂及陸軍速成學堂，並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成立軍醫學堂。（註四五）然而上述各式學堂不論是在軍事幹部的培養上，或是

註四一：李根源，《雪生年錄》，卷一，頁九～一〇。由於清廷派赴日本習軍事的學生大多未具備軍事學基礎，而且又不諳日語，日本陸軍省乃委託成城學校代訓這批中國學生，結業後再升入日本各軍事學校就讀。後來因中國留學生日多，日本陸軍省乃於一九〇三年七月成立振武學校，專門接納學習軍事的中國留學生，以做爲進入日本士官學校或其他軍事學校的預備學校。

註四二：茅海建，〈雲南陸軍講武堂與雲南辛亥起義〉，頁七三。

註四三：晚清陸軍軍事教育雖分爲陸軍小學、陸軍中學、陸軍兵官學堂及陸軍大學堂四級，惟陸軍大學堂係專爲培訓高級軍官而設。

註四四：同註四二。

註四五：《雲南辛亥革命史》，頁七〇。

對雲南軍界的影響上，皆遠遜於雲南陸軍講武堂。講武堂學生與其他軍事學堂學生最大的不同是，他們在入堂前已有軍事經歷，有的甚至已擔任中級軍官，而畢業後又繼續擔任軍職。因此講武堂學生的政治思想若有變動，將會直接影響新軍的政治態度，也會嚴重威脅清廷的統治地位，這是清廷當初創辦講武堂所始料不及的。（註四六）有鑒於此，本節乃以雲南陸軍講武堂為敘述主體。

在清季各省興辦的講武堂之中，雲南陸軍講武堂可說是最為重要的一所，它不僅在滇省是赫赫有名，就是在國內軍界也享有極高的聲譽。雲南陸軍講武堂的興辦，與滇省新軍編練有密切的關聯。雲南陸軍講武堂初辦於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錫良督滇任內，總辦由雲南陸軍小學堂（於光緒三十二年設立）總辦胡景伊兼任，教官亦多由陸小教官兼，但只辦了七個多月就停辦了。而講武堂初辦期間（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雲南新軍的編練也幾乎是原地踏步，毫無進展。（註四七）其後雲南陸軍第十九鎮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編立，而巡防隊亦適於此時改定營制，在在皆急需新式幹部人才。這種現象表現在下述兩方面：

(1)軍官數量少，不敷使用。據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七月呈報陸軍部的〈陸軍第十九鎮報告表〉統計，第十九鎮全鎮官佐缺編六十名，約佔軍官總數的百分之八；其中與軍事指揮直接有關的軍官缺編二十四名，約占百分之五。（註四八）

(2)軍官素質低，不能勝任。雲貴總督李經羲（宣統元年到任）曾經奏稱：「滇軍成鎮過速，現任官佐新舊參雜，黨派紛爭，瑕瑜互見，將領多不得人，中下級軍官學庸品卑，臨、榆（大理）兩標尤甚」，「滇軍次級軍官其由學堂出身者實居少數」。（註四九）新軍幹部素質低落，至於防營官長那就更差了，「類皆目不識丁的武人」。（註五〇）

雲南本來設有陸軍小學堂一所（一九〇六年創立），但根據清政府正規軍事教育的規定，造就一名初級軍官，由陸小至陸中，再由陸中經陸軍入伍生而至陸軍兵官學堂（即民國

註四六：謝本書，《蔡鍔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頁二六～二七。

註四七：茅海建，前引文，頁七四。

註四八：同前註。

註四九：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陸軍部檔》，轉引自《雲南辛亥革命史》，頁六九～七〇。

註五〇：陳天貴，〈回憶辛亥革命前後〉，《辛亥革命回憶錄》（六）（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頁一五五。

以後的保定軍官學校），兵官學堂畢業後充見習官，到正式補排長、隊官之職，共需時七年四個月。（註五一）糜時耗日，根本無以濟燃眉之急。而雲南陸軍速成學堂又成效不彰，同時陸軍部也不可能再派出大量軍官來滇，且此刻各省都在編練新軍，都需要新式幹部人才。在此情形下，唯一的辦法就是開辦新的軍事學堂。於是滇省遂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奉准開辦了兩所軍事學堂：一所是陸軍第十九鎮隨營學堂，招考新軍之中學、術科優秀的軍士和普通學堂學生入堂學習；另一所即復辦的雲南陸軍講武堂。

講武堂校址設於昆明承華圃，（註五二）總辦（即校長）初為胡景伊，隨即由兵備處總辦高爾登兼任，監督（相當教育長）則檄調剛自日本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六期畢業的滇籍士官生李根源出任。（註五三）同時又以李根源之請，將其士官六期同學羅佩金（亦滇人）由廣西調回雲南，出任第十九鎮隨營學堂監督，並兼講武堂教官。（註五四）另外講武堂並設提調一人，掌理全校行政業務，亦由士官六期畢業生張開儒（亦滇人）擔任。由於總辦高爾登僅為兼任，講武堂大權多在李根源手中；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四月李根源更繼高爾登之後出任總辦，監督之職則委諸士官同學沈汪度（湘人，士官五期生）。李根源、沈汪度、張開儒都是在留日期間即加入同盟會的革命黨人，他們既然擔任了雲南講武堂的重要行政職務，取得了講武堂的領導權，乃大量援引士官同學，如方聲濤（閩人，士官四期）、唐繼堯、羅佩金、庾恩暘、李鴻祥、顧品珍、謝汝翼（以上皆滇籍士官六期生）、李烈鈞（贛人，士官六期）、劉存厚（川人，士官六期）等人，皆於此時進入講武堂分任教官等職。而這批士官生幾乎都是同盟會員，在這種情形下，日後雲南陸軍講武堂乃成為滇省革命的策源地。（註五五）

註五一：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台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民國六十一年一月），第一冊，頁一二九～一三〇。

註五二：雲南陸軍講武堂被中共指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並在一九九二年昆明舉辦的第三屆「中國藝術節」上，與昆明西郊的民族村並列為兩大觀光景點。講武堂現存保留部份已按原樣整修一新，惟較原址則縮小甚多。陶任之、胡以時，〈滇軍的搖籃——雲南陸軍講武堂〉，《雲南文史叢刊》，一九九一年第四期，頁七八。

註五三：李根源，《雪生年錄》，卷一，頁一七。李根源另兼步兵科教官。

註五四：祝鴻基，〈陸軍第十九鎮及雲南講武堂對辛亥革命的關係〉，《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一一三。時羅佩金在廣西提督龍濟光處任隨營學堂總辦，頗不得意。

註五五：謝木書，《唐繼堯評傳》（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頁一二。

雲南陸軍講武堂開辦之初，先後制定了〈雲南陸軍講武堂試辦章程〉和〈改訂雲南陸軍講武堂章程〉兩個規章，其指導思想及內容，大體上是仿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教育宗旨和訓練方法而制定的，因此雲南陸軍講武堂是深受日本軍事教育思想的影響。（註五六）根據章程，講武堂校內的行政建置，在總辦之下設立五處，分別是監督處、提調處、編修處、財務處及軍醫處。（註五七）兵科有步、砲、騎、工程四種；學生則分甲、乙、丙三班。（註五八）甲班係調選陸軍第十九鎮管帶、督隊官、隊官、排長共一百二十名；乙班是調選巡防營管帶、幫帶、哨官、哨長共一百名；丙班則為招考貢生、廩生、普通中學堂學生二百名。（註五九）丙班生因無舊軍官積習，文化水平及思想素質均高於甲、乙兩班，且又接受有系統之正規教育，故嗣後雲南陸軍講武堂畢業生中，亦以丙班生人材輩出，成就較大。（註六〇）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第十九鎮隨營學堂併入講武堂，羅佩金改任陸軍小學堂總辦，而隨營學堂則歸併於講武堂丙班；隨後並從丙班學生中（包括第十九鎮隨營學堂併入之學生），挑選成績優異者一百名，特授學術，提早分科，是為特班生，其較丙班生提早半年畢業，以應各部隊所需（朱德、朱培德等人即特班生）。此外，講武堂又從優級師範畢業生中挑選有志於軍事者三十人，是為附班生（楊綏即為附班生）。（註六一）如此一來，雲南陸軍講武堂的規模變大，班次增多，學生數量也急速增加，已經超過〈練兵處新訂陸軍學堂辦法〉的規定。它不再是一所單純的軍事補習教育學堂，而是融合正規、速成、補習三種軍事教育於一爐的新式陸軍學堂，同時也成為培養雲南軍界幹部人才最重要的搖籃。

由於雲南陸軍講武堂的主事者、教官、隊職官大多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因此滇省講武堂的制度和作風乃仿效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紀律非常嚴格。（註六二）在學制方面，甲、乙班的學制皆為一年，丙班及特別班學制則各為三年及兩年半。（註六三）課程方

註五六：《雲南辛亥革命史》，頁七一～七二。

註五七：周開助，〈雲南講武堂的回憶〉，《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一六五。

註五八：陶任之、胡以時，〈滇軍的搖籃——雲南陸軍講武堂〉，頁七九。

註五九：李根源，《雪生年錄》，卷一，頁一七。一說丙班生為一百五十名，見陶任之、胡以時，前引文，頁七九。

註六〇：同註五八。

註六一：李根源，《雪生年錄》，卷一，頁一七。

註六二：周開助，〈雲南講武堂的回憶〉，頁一六八～一六九。

註六三：附班生學制未見記載，當與丙班相似。

面，甲、乙兩班入學後即專習軍事學科，如地形學、築城學、兵器學、軍制學、衛生學等，並習本兵科課程，如本兵科的典、範、令等。丙、特兩班入學後則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先習普通學科及軍事學基本課程，丙班為兩年、特班為一年；學科計有國文、英文、法文、倫理、器械畫、算術、史地、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陣中勤務令、工作教範等，術科則有制式教練和野外演習等。第二階段開始分兵科，專習軍事學科和本兵科課程。（註六四）而丙班生在第一階段普通課程完成後，則調入第十九鎮各營受入伍生教育；三個月期滿，回校受軍士、軍官教育，學習第二階段課程。（註六五）學生每天上六小時課，出兩小時操，早晨有體操和跑步，晚上還有自習，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外，沒有一刻的休息；並且晚上就寢後，還常有緊急集合的練習。（註六六）在教學和訓練過程中，教官及隊職官都能以具有軍事素養的新軍人風範，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對於學生的教育訓練，講武堂強調在講授軍事知識的同時，更著重訓練學生掌握實際的軍事技能，在訓練中「少講多操」，這也是日本軍事教育方針中「以簡易與實用為主」的原則。（註六七）由於課程完善，教學嚴格，使得雲南陸軍講武堂畢業的軍官素質較當時其他省屬的軍事學堂要高一籌，並在日後雲南光復及護國討袁二役中有傑出的表現，贏得極高之讚譽。

在雲南陸軍講武堂四十一名教官（員）中，其政治立場據統計有十七人為同盟會員，十人為支持革命的反清革命派，五人態度傾向革命，支持革命者合計共三十二人，佔教官（員）總數（四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八。（註六八）這個數字是相當高的。由於講武堂的重要職務幾乎都由革命黨人擔任，這些黨人於授課之餘，一遇機會即力闡民族主義，宣揚革命思想。李根源曾說道：「我辦講武堂時，專意鼓吹革命。」（註六九）曾任軍事學教官的

註六四：茅海建，〈雲南陸軍講武堂與辛亥雲南起義〉，頁七四。

註六五：陶任之、胡以時，〈滇軍的搖籃—雲南陸軍講武堂〉，頁七九。辛亥革命爆發時，講武堂甲班、乙班、特班生皆已畢業下部隊，因在雲南光復之役立有戰功並已授官任職，故其後敘期分列第一、二、三期，准免回校復訓。丙班生於辛亥革命爆發時仍在校就學，雖曾以學生隊參加戰鬥，但革命後仍回校復訓，畢業後列為講武堂第四期。

註六六：祝鴻基，〈陸軍第十九鎮及雲南講武堂對雲南辛亥革命的關係〉，頁一一五。

註六七：《雲南辛亥革命史》，頁七五。

註六八：李根源，〈雲南承華團陸軍講武堂同人錄〉，《曲石文錄》，附錄。另見《雲南辛亥革命史》，頁七三。

註六九：李根源，〈拚死〉，《曲石文續錄》，卷四。

李烈鈞也稱其在雲南講武堂時，「以培養幹部參加革命爲主旨」。（註七〇）另一軍事學教官唐繼堯更曾在講武堂上，爲學生講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註七一）雲南陸軍講武堂在前後幾任總辦、監督及各級教官的努力下，不僅奠定其可大可久的規模，更培育出一批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新軍軍官，當他們畢業後充任第十九鎮各級幹部，便把革命的種子散播於第十九鎮全軍中。一位講武堂畢業生祝鴻基後來回憶說：「講武堂在這兩年當中，造成了八百多名的帶兵官，也就是造成了第十九鎮中的革命力量。並且第十九鎮駐在省城附近，各部隊的長官又多係革命黨人，所以（雲南）革命力量優於反革命……多矣。」（註七二）是時滇軍中級幹部多由留日士官生充任，而講武堂畢業學生則分發滇軍爲下級幹部；他們在士兵中宣傳革命思想，運動部下，遂使雲南新軍第十九鎮上下皆充滿革命精神，爲不久後的雲南辛亥起義創造了良好的形勢。

五、雲南辛亥起義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風聲所播，全國震動。當革命消息傳入雲南之後，滇省軍界乃屢次密商，亟謀響應。這一切，都必須從革命勢力進入雲南新軍中談起。

先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雲貴總督李經羲因與新軍第十九鎮統制崔祥奎不和，乃將崔氏罷去，以第三十八協統領鍾麟同取代崔氏任第十九鎮統制，另調曲同豐充任第三十八協統領。此外，並以李根源爲講武堂總辦，沈汪度接任監督。（註七三）其後李經羲復因總參議靳雲鵬專權任私，頗疑其別有意圖，遂召李根源、羅佩金二人入見，要他們薦舉軍事人才；羅佩金乃乘機推薦日本士官三期生蔡鍔，爲李氏採納。（註七四）時蔡鍔正任職廣西

註七〇：李烈鈞，〈李烈鈞將軍自傳〉，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台北：民國五十年），第二編第三冊，頁一八一。

註七一：祝鴻基，〈陸軍第十九鎮及雲南講武堂對雲南辛亥革命的關係〉，頁一一五。

註七二：同前註，頁一一三。

註七三：同前註。

註七四：李根源，〈羅佩金事狀〉，《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頁三一七。

軍界，因革命態度不明，廣西同盟會員乃發動「驅蔡風潮」，蔡頗為其所困。（註七五）李經羲原為廣西巡撫，本已熟知蔡鐸的為人，今又有羅佩金為其保薦，乃命羅佩金「密電召鐸，勿與靳（雲鵬）知」。（註七六）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四月，蔡鐸由桂來滇，出任第三十七協統領（原統領王振畿調充兵備處總辦），羅佩金則出任第七十四標統帶。蔡、羅皆日本士官畢業生，羅為同盟會員，蔡雖非革命黨人，但立場接近。蔡鐸、羅佩金既出掌高位，乃援引革命同道（多為留日士官生、同盟會員）唐繼堯、劉存厚、雷飆充第七十四標各營管帶，李鴻祥為第七十三標管帶，謝汝翼、庾恩暘任炮標管帶，韓鳳樓為工程營管帶，李鳳樓充機關槍營管帶。（註七七）這批軍官於掌握實權後，就其職務之便，積極佈置人事。如唐繼堯出任七十四標第一營管帶後，即委派同盟會員黃毓英為該營見習排長、鄧泰中（唐氏表弟，亦為同盟會員）為司務長，使其深入各營隊裡面去做宣傳革命的工作。（註七八）於是革命勢力乃日漸充斥於新軍第十九鎮中。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爆發；八月末，湖北武昌首義之消息已傳遍滇中，據新軍軍官劉存厚記載，當時雲南「人民如醉如痴，一般志士欲舞欲狂」。（註七九）雲貴總督李經羲、十九鎮統制鍾麟同等則對此大為惶恐，連日召集各司道等秘議防禦之法；並一面飛調蒙自巡防軍四營來省支援，一面在軍械局建築碉樓，以防襲擊。李、鍾等對七十四標及炮隊猜疑尤甚，防範更嚴，入夜則派偵探到七十四標防地巫家壩一帶搜索。（註八〇）滇省革命時機既迫，革命風潮亦日愈高漲，軍界人士乃有集議革命之舉。是時滇中軍界派系分歧，互相猜忌，而各派中雖不乏具有革命思想者，然均各不相謀，未能一致。尤其對於革命領導

註七五：「驅蔡風潮」之來龍去脈，請參見謝本書，《蔡鐸傳》，頁一七～二一。

註七六：李根源，〈羅佩金事狀〉，頁三一七。羅佩金祖父為翰林出身，李經羲向喜世家子弟，故對羅佩金甚表依重。

註七七：祝鴻基，〈陸軍第十九鎮及雲南講武堂對雲南辛亥革命的關係〉，頁一一三。

註七八：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一一一。黃毓英，雲南會澤人（與唐繼堯同鄉），入日本東斌學校習軍事。業未畢，由日本歸滇，往來大理、蒙化間，從事革命活動。邊吏捕之急，毓英乃遁入省城，曾往唐繼堯處密談國事；唐氏因毓英困乏，時常予以接濟。毓英後以唐繼堯及李鴻祥力保，得入七十四標唐營充見習排長，旋調充七十三標第三營（管帶李鴻祥）右隊排長，在滇省光復一役中有傑出的表現。詳見蔡鐸，〈黃武毅公墓志銘〉，《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八九；〈黃武毅公事略〉，《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頁二六八～二六九。

註七九：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頁一三。

註八〇：同前註，頁一三～一四。

問題，更是有了很大的歧見。當時雲南軍界一派主張雲南的革命應由雲南人領導，持此意見者有羅佩金、殷承瓏、李根源等（皆滇人）；另一派則主張推舉蔡鍔為領導，因為蔡資格老（蔡為日本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三期畢業生，當時雲南軍界中堅多為士官六期畢業生），有才幹，有眼光，且任職協統，階級較高。（註八一）當時擁蔡一派因包括三十七協五名管帶雷飆、劉存厚、唐繼堯、李鴻祥、謝汝翼及講武堂監督沈汪度，實力較大，較能掌握全局。（註八二）於是自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到九月初七（十月二十八日）這十三天之中，擁蔡派新軍軍官瞞過李根源等人，召開了五次秘密會議，籌商雲南起義有關事項。

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晚上七時至十一時，雲南同盟會員唐繼堯、劉存厚、殷承瓏、沈汪度、張子貞、黃毓成等六人在昆明蕭家巷劉存厚家中，召開起義前的第一次秘密會議。會中討論下列事項：「一、劉存厚（川人）報告四川爭路之近情可為革命之機會；二、研究革命之進行法；三、聯絡革命必要之人材；四、同舉穩慎周詳可與謀革命之人員（本夜列席者勿論）：蔡鍔、韓鳳樓、羅佩金、雷飆、李鳳樓、劉雲峰、謝汝翼；五、同議可共事革命之人員：李根源、庾恩暘、李鴻祥、黃毓英、鄧泰中等。」（註八三）會後與會諸人乃分頭連絡同志，擴大起義的基礎。

八月二十八日（西曆十月十九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蔡鍔、唐繼堯、劉存厚、羅佩金、雷飆等五人又在劉存厚家中，召開第二次秘密會議。會中議決：「一、聯絡官兵，期與可靠之官長逐層組織小團體，且與敵血為盟，以堅其信用，而為有把握之舉動；二、預備子彈以備急需；三、嚴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註八四）當時革命黨人原本即暗中新軍內進行活動，各級皆有人負責，至是則更為加緊進行。「其中主要做這一工作的有黃子和（即黃毓英）、黃永社、鄧泰中、楊葵等人。對軍隊、學校中可靠的人員進行運動聯繫，尤其是黃子和進行得最積極，隨時都將情況對各標營的負責人互相交換。」（註八五）在彈藥

註八一：李鴻祥，〈增補雲南辛亥革命回憶錄〉，《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一輯—辛亥革命在雲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月），頁四三。

註八二：同前註。

註八三：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附錄七，〈雲南光復前秘密會議記事表〉，頁三〇。

註八四：同前註。

註八五：祿國藩，〈辛亥革命前後有關雲南史實三則〉，《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一二三。

儲備方面，講武堂於學生每次野外實彈射擊時，限令每人所發的十五發子彈中僅能射擊五發，其餘十發則歸繳校本部秘密儲藏，以備革命之用。（註八六）另外新軍各標營則以訓練打靶需用實彈，遂由標本部領取少量彈藥發營儲存備用，雲南光復之夜即持此項儲備彈藥應用。（註八七）

同年九月一日（西曆十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時至第二天凌晨一時，蔡鍔、唐繼堯、劉存厚、沈汪度、謝汝翼、韓鳳樓等六人在昆明北門街沈汪度寓所中，舉行第三次秘密會議。討論內容為：「一、由列會各員報告所部官兵目下對於革命程度如何：(1)劉存厚報告，就其所部而論，以在營日久，與官兵相習，感情甚篤，可有把握；(2)謝汝翼報告，所部炮營亦有把握；(3)韓鳳樓報告，所部官長程度太差，卻無把握。二、本日到會人員不齊，他營情形不得而知。現步、工（營）程度既以不一，宜不急進主義，銳意經營。」（註八八）

九月四日（西曆十月二十五日）晚上七時至十時，蔡鍔、唐繼堯、劉存厚、沈汪度、殷承瓚、張子貞、雷飆等七人在劉存厚家中，舉行第四次秘密會議。是夜天雨，與會人員均不帶隨從，冒雨單人步行赴會。此晚會議內容為：「一、歃血為盟：屆時劉存厚摒去妻子、婢役，由殷承瓚於白紙上書『協力同心，恢復漢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字；書畢，火化調於酒中，分飲之以結同心。二、提議實施革命，同人贊成；惟殷承瓚主張緩辦，以對外不足，兵心不一為可慮。」（註八九）顯見新軍軍官對革命已有急進、緩進之分。

九月七日（西曆十月二十八日）晚上七時至第二天凌晨三時，蔡鍔、唐繼堯、劉存厚、沈汪度、張子貞、李鴻祥、黃毓英、黃永社等八人在昆明洪化橋唐繼堯家中，舉行第五次秘密會議，這也是昆明辛亥起義前最後一次秘密會議。在這次會議裡，決定發難日期為陰曆九月初九夜三時（即九月十日凌晨三時），並具體研究了起義的兵力安排。（註九〇）會中議決事項有：「一、兵力之決定：陸軍第三十七協所屬之步兵第七十三、七十四兩標，炮兵第十九標。二、攻擊之計劃：(1)省城大東門至小西門以北地區，歸七十三標占領；(2)省城大東

註八六：祝鴻基，〈陸軍第十九鎮及雲南講武堂對雲南辛亥革命的關係〉，頁一一五。

註八七：祿國藩，〈辛亥革命前後有關雲南史實三則〉，頁一二一。

註八八：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頁三〇～三一。

註八九：同前註，頁三一。

註九〇：謝幼臣，〈光復滇省事略〉，《雲南辛亥革命資料》，頁二。

門至小西門以南地區，歸七十四標占領；(3)炮兵陣地在大、小東門及小西門至南門城牆一帶放列，向督署、五華山、軍械局射擊；三、臨時率兵官之決定：(1)推蔡鐸為臨時革命總司令；(2)步兵七十四標第一營臨時管帶以唐繼堯任之；（註九一）(3)步兵七十三標第一營臨時管帶以李根源任之；（註九二）(4)步兵七十三標第二營臨時管帶以劉祖武任之；(5)炮兵第十九標，每營出炮六門，按第一、二、三之次序附於步兵第七十四標一、二、三營。四、革命實施時日之決定：宣統三年九月初十日（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前三時。五、革命軍口令標示之規定：(1)口令為『軍』（軍械局）、『總』（總督署）；(2)我軍帽上附白袋。」（註九三）

從五次的秘密會議可以說明，雲南辛亥起義是經過相當縝密的策劃，其事先的準備工作也是相當充分的。而根據劉存厚的記載，先後參加五次會議的滇軍軍官共十四人，其中唐繼堯、劉存厚二人五次都到會，蔡鐸、沈汪度二人四次與會，張子貞三次到會，雷飆、殷承瓚二次到會，餘皆僅到會一次，這表明了唐、劉、蔡、沈四人是昆明辛亥起義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註九四）而原為同盟會雲南支部的重要幹部，如羅佩金僅參加一次會議，李根源則始終未曾與會，這可能與先前所述對於革命領導問題的分歧有關。五次會議與會者大多為擁蔡派，李根源等自與彼等意見不協，無怪日後李鴻祥（亦為擁蔡派）回憶道：「結果（與會諸人）決定選蔡鐸為領導，此後，羅（佩金）、殷（承瓚）、李（根源）等未參與會議。」（註九五）而雲南辛亥起義的領導與策劃，亦主要是由擁蔡派的新軍軍官負責。

舉義計劃確定後，宣統三年九月八日、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兩天，革命黨人乃分頭聯絡，準備起義。是時「風聲日緊，消息外傳。清總督李經羲秘商靳雲鵬、鍾麟同、王振畿、唐爾錕等，欲出羅佩金、李根源於外，並擬懲辦李鴻祥、謝汝翼，又

註九一：先前唐繼堯出任七十四標第一營管帶時，因宣揚民族主義，為忌者中傷，乃調任講武堂監督，在職僅月餘。今以革命之故，因唐氏與第一營官兵有舊關係，乃回任之。見佚名，《唐繼堯》（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無出版年月），頁一四。

註九二：李根源因革命之嫌於宣統三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解講武堂總辦之職，調任督練處副參議官。

註九三：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頁三一～三二。滇軍軍帽於夏季時外罩白布套，時已入秋，官兵軍帽所罩白布套已經脫除，今為識別敵我，乃於起義時重新罩上，見李鴻祥，〈增補雲南辛亥革命回憶錄〉，頁四五。

註九四：《雲南辛亥革命史》，頁九七～九八。

註九五：李鴻祥，〈增補雲南辛亥革命回憶錄〉，頁四三。

命唐爾錕、劉顯治，由黔募兵。」（註九六）情勢非常急迫。李經羲等人爲了防制黨人起事，乃發子彈給七十三標、機關槍第十九營、憲兵第十九營（以上皆清吏較能掌握之部隊），令其暗中戒備，以防七十四標及炮標起事，並在城內戒嚴。（註九七）九月九日清晨七時，第十九鎮統制鍾麟同突然至七十四標及炮標駐地巫家壩，集合官兵講話，聲稱當晚有人作亂，將謀革命，凡發覺妄言革命者來報，一律賞金昇官。（註九八）黨人劉存厚、雷飜以當晚清吏定有準備，不如延至明晚（即十日夜）起義，蔡鏜亦同意此議。然唐繼堯、李鴻祥等對延期事不表同意，認爲此事已通報各方同志，若改期則機密將會洩露。於是延期一事作罷，一切遂照原計劃進行。（註九九）九日下午三時，蔡鏜、唐繼堯、李鴻祥、沈汪度、張子貞、雷飜等人再次聚會，決定照原議於當夜舉義。（註一〇〇）

九月九日晚上七時，蔡鏜、唐繼堯、李鳳樓等先後至巫家壩，乃於七十四標標本部召集劉存厚、雷飜、庾恩賜、劉雲峰、謝汝翼等人會議，分配戰時任務。（註一〇一）當晚八時許，北較場七十三標第三營李鴻祥部排長黃毓英等派士兵抬子彈準備起義，被值日隊官唐元良發現（唐係北洋派），加以攔阻。黃毓英等乃開槍擊斃之，另外又打死了幾個北洋派軍官，於是李鴻祥立即集合部隊，宣布起義，昆明起義遂正式爆發。（註一〇二）起義爆發後，七十三標標統丁錦（亦北洋派）逃走，李鴻祥乃與聞訊趕到的李根源率七十三標起義官兵攻破北門，進攻軍械局和五華山。而正在巫家壩部署起義的蔡鏜、唐繼堯等人聞訊立即召集所部，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戰方針，並公推蔡鏜爲臨時革命軍總司令，眾皆三呼「萬歲」以示贊同。然後整隊出發，配合七十三標，向總督署等地發動攻擊。（註一〇三）

在昆明起義的過程中，革命軍曾與清軍進行激烈的戰鬥。當時總督署內有衛隊五、六百名，機關槍八挺，負隅頑抗，故進攻督署的戰鬥最爲慘烈。唐繼堯督率所部猛撲督署，力戰

註九六：孫種因（即孫仲瑛），〈重九戰記〉，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頁二三九。

註九七：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頁一三。

註九八：謝幼臣，〈光復滇省事略〉，頁二。

註九九：劉存厚，前引文，頁一五～一六。

註一〇〇：謝幼臣，前引文，頁三。

註一〇一：劉存厚，前引文，頁一六。

註一〇二：李鴻祥，〈增補雲南辛亥革命回憶錄〉，頁四六～四七。

註一〇三：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頁一八。

二時許，死傷三十餘人，仍不能前進。（註一〇四）唐氏乃命炮兵向督署猛擊，炸毀署內房屋數十處，督署衛隊死傷數十名。（註一〇五）因久攻不下，唐氏遂與劉存厚協商分道合擊之策。是時攻克軍械局之捷報傳來，起義官兵士氣大振，即往取大量彈藥補充，隨向督署發動總攻擊，督署衛隊不支潰走，革命軍遂順利佔領總督署。經一晝夜的苦戰，至第二天（宣統三年九月十日，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午，革命軍攻克昆明城內的制高點五華山，也佔領了總督署，總督李經羲藏匿民間，第十九鎮統制鍾麟同當場被殺，總參議靳雲鵬化裝逃走，昆明辛亥起義遂宣告成功。此役起義官兵戰死一百五十餘人，負傷三百餘人；敵方死者二百餘人，傷者百餘人。（註一〇六）因此後世的史家乃謂：「雲南省城起義，是除首義湖北以外，獨立各省革命黨人組織的省城起義中，戰鬥最激烈、代價也最鉅大的一次。」（註一〇七）

昆明起義成功後，雲南各府州縣傳檄而定，滇省迅速光復。九月十日（西曆十月三十一日）晚，蔡鍔、唐繼堯、劉存厚、殷承瓏、雷飆等人在道署商議善後事宜，議決：「一、臨時政府之組織並參謀部之職守；二、都督府決定以五華山師範學堂改作；三、照會英、法兩國領事宣布獨立；四、慰勞戰勝軍；五、訪查李經羲所在。」（註一〇八）次日（九月十一日，西曆十一月一日），舉義諸人於五華山成立「大漢雲南軍政府」，公推蔡鍔為雲南都督，下設參議院及參謀、軍務、軍政三部。雲南軍政府同時發布了〈討滿洲檄〉，檄文重申了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並聲明「有渝此盟，四萬萬同胞共擊之」。在辛亥各省起義的宣言或檄文中，重申同盟會十六字綱領的省份是不多的。（註一〇九）

雲南軍政府成立之後，採取一連串的改革措施，取得相當的成效，奠定軍政府穩固的基礎。在當時起義各省中，要以雲南內部最為穩定，據蔡鍔的說法，這是因為「滇省此次反

註一〇四：孫種因，〈重九戰記〉，頁二四一。

註一〇五：庾恩揚，《再造共和唐會澤大事記》（昆明：雲南圖書館，民國六年），頁一六。

註一〇六：孫種因，前引文，頁二四七。

註一〇七：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一四五。

註一〇八：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志〉，頁二五。

註一〇九：《雲南辛亥革命史》，頁一三一。

正，純由陸軍主動，故勢力雄厚，不旬日而全滇底定。其主要人員，多有政治知識與經驗，故一切善後布置，俱能井井有條，秩序上之整嚴，實為南北各省之冠。」（註一一〇）但更重要的是，領導雲南起義的新軍軍官中，大多為革命黨人（蔡鐸雖非同盟會員，但革命立場接近），他們曾與效忠清廷的軍隊進行艱苦的作戰，事後在雲南新政權裏他們亦居重要的地位，掌握大權，遂使雲南成為起義各省當中，革命進行較為徹底的一省，並在日後維持了長期的安定；甚至民國四年雲南首舉護國討袁義幟，亦當與此有密切的關係。此實為雲南最初推展軍事改革時所始料未及的。

六、結 語

雲南的軍事改革係肇始於庚子一役之後，其最初即是納入全國軍事體制中；其間雖經清廷中央及歷任總督的努力推動，但其成果卻僅能算是差強人意。原先練兵處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奏定雲南編練新軍兩鎮，並限五年完成，但終清之世，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僅只編成新軍一鎮。雖然如此，但是雲南新軍仍有其可觀之處。在全國新軍編練的成績中，雲南新軍僅次於北洋及湖北，而遠在其他西南各省之上；這也埋下了民國以後，滇軍縱橫西南的伏筆。

在雲南軍事改革的推展過程中，就如同其他領域的改革一般，領導人物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雲南雖說自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後即開始練兵，但真正稍有規模是要到光緒三十三年錫良出任雲貴總督以後的事了。故而日後蔡鐸就曾說道：「前清總督丁振鐸在滇不得清廷信任，就一事不能辦。錫良到滇為中央所信任，所以向德國購械，成立第十九鎮，得到中央指定專款，措置裕如。」（註一一一）宣統元年滇軍得以擴充成鎮，就是在錫良先前的基礎上建立的。

雲南新軍編練成鎮後，其裝備完全仿倣北洋六鎮，自德國購置各項武器裝備。尤其值得

註一一〇：蔡鐸，〈滇省光復始末記〉，頁二二七。

註一一一：李文漢，〈護國軍起義前蔡鐸與唐繼堯的關係〉，《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一九七九年四月），頁三二～三三。

重視的是，由於滇省原先計劃編練兩鎮新軍，故其武器裝備的購置皆以兩鎮為度。日後滇軍武力成為南中之強，甚至僅憑滇省一隅對抗袁世凱全國之力，絕非偶然。在兵員方面，雲南採取以全省為範圍的募兵計劃，佐以優渥的待遇等條件，遂使第十九鎮得以吸收一批質樸的農家子弟，構成新軍的主體。惟其自一開始地方色彩即十分濃厚，對於日後軍事改革確有不良影響。在湖北、貴州等省編練新軍的過程中，有許多下層知識份子紛紛參加新軍行伍；甚而許多新軍士兵後來成為學者專家。（註一一二）然而雲南卻幾乎無此現象，因為知識份子大多透過軍官養成系統進入軍中。

雲南軍事幹部的培養，是其軍事改革極有成效的項目之一。在雲南編練新軍的過程當中，其軍官的培養途徑，一是派遣留學生，一是開辦新式軍事學堂。留學生係以留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為代表（尤以第六期士官畢業生為主體），這批學生在日本接受完整的軍事教育，返國後又紛紛加入雲南新軍的行列，構成新軍第十九鎮中級幹部的主體，對雲南軍事改革自然起了積極的作用。在開辦軍事學堂方面，雲南先後成立陸軍小學堂、陸軍速成學堂、軍醫學堂、陸軍測繪學堂等學校，不但提供了雲南陸軍幹部的來源，亦顯現出初步軍事專業化的傾向。惟若論及培養幹部之眾與影響之深遠，則當推雲南陸軍講武堂。雲南陸軍講武堂之所以聲譽卓著，克享盛名，實基於三個因素：一、優良的師資：講武堂自籌備以至創辦，皆由留日士官生負責，其後講武堂的教官、隊職官亦多由士官生充任。這批士官生完全將他們在日本所受軍事訓練搬到雲南講武堂上，勤教勤練，奠定講武堂可大可久之基礎。二、優秀的學生：講武堂的學生中，甲、乙兩班多為在職軍官，知識程度稍差；而丙班及特班生則為招考應試，文化水準較高（規定貢生、廩生、普通中學堂學生才能應考）。由於學生的知識較高，學習精神較主動，加上講武堂師承日本陸軍教育系統，訓練極為嚴格，因而造就一批優秀的初級幹部人才，並在日後辛亥起義、討袁護國諸役中立下很好的表現。三、濃厚的革命風氣：由於講武堂多為留日士官生操持，而這批士官生在日本時多已加入同盟會，此刻乃運用各種方式宣揚革命，雲南陸軍講武堂竟演為滇省革命的溫床。在此情況下，講武堂學

註一一二：蘇雲峰，《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修訂版），頁二七〇。另見Sutton,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1925*, p.69.

雲南新軍與辛亥革命（一九〇七～一九一一）

生革命態度自有極大改變。辛亥前夕，講武堂首批畢業生（特班）開始分發下部隊，他們於是在士兵中開展組織，串連同志，傳播革命思想，為辛亥雲南起義創造良好形勢。

雲南革命運動雖經長時期的醞釀及仁人志士大量心血的投注而漸趨成熟，但滇省辛亥起義則大抵是由新軍主動發動，並一舉推翻清廷在雲南的統治，建立新的地方政權。其間起義軍官雖對革命有急進、緩進意見的分歧，然而最後當革命的一刻到來時，雙方仍能捐棄前嫌、攜手合作，共謀革命之進行，這是雲南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清廷編練新軍的動機原是為延長其國祚，但若從雲南的例子來看，雲南新軍不僅沒有達到此目的，反而成為清廷的一道催命符。這不但印證了本文前言所謂「清廷施行軍事改革雖是為強化傳統體制，但其結果終不免反過來衝擊傳統體制，甚至瓦解傳統體制」一語，亦是清末編練新軍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之一。